

# 伪译“乾隆御制诗”： 马塞厄斯《诗札》中的保守主义与帝国建构\*

张执遥

**内容提要** 马塞厄斯的《诗札》(1795)虽号称乾隆诗歌的英译本,但实则是作者本人针对英国时政的评论。本文结合文学史脉络与英国十八世纪末的政治语境,认为该长诗在表达作者保守主义立场的同时也宣扬了英帝国观念。《诗札》以中国主体的认可为英国意识形态赋权,同时也想象中国主体对英帝国体系的顺服,这种文学机制彰显了现代性初兴之际英国对中国主体性既依赖又压抑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 马塞厄斯 《诗札》 伪译 保守主义 英帝国

1795年,一位匿名作者在伦敦出版了一首长达438行的英雄双韵体诗歌,不仅题名——《1794年中国皇帝乾隆致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三世的御制诗札》<sup>①</sup>(下文简称《诗札》)——迎合英国读者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心理,且全诗也始终强调作品的异域色彩:出版物的封面称该诗译自“汉诗原文”(Imperial: Title Page),开篇的《前言》讲述“译者”的翻译过程与理念,遍布全书的“译者注”更引用多部汉学著作以进一步解释诗歌中的中国元素。然而,该诗内容实则与英国时政紧密相关:诗中,乾隆赞许访华的马戛尔尼,随即幻想小威廉·皮特首相携英国政要肖像入京,借机品评英国国内政治人物与事件,同时针对英国的激进改革风潮向乔治三世提出治国建议,并直接批评法国大革命。或许正因《诗札》与当下政治紧密相关,同时代读者立即觉察到它并非乾隆之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世纪欧亚文学交流互鉴研究”(21&ZD278)的阶段性成果。

① See Anon. [Thomas James Mathias], *The Imperial Epistle from Kien Long, Emperor of China, to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c. &c. &c. in the Year 1794*, London: Printed for R. White. 该著大概于1795年出版。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Imperial”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作，故称之为“虚构书信”<sup>①</sup>，将其“译者”称作“所谓的译者”<sup>②</sup>“作者”<sup>③</sup>或“作家”<sup>④</sup>；至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人已发现《诗札》的真正创作者是诗人托马斯·詹姆斯·马塞厄斯<sup>⑤</sup>。

马塞厄斯在十八世纪末的欧洲文坛颇具影响力，其代表作是评鹭同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对文学的追求》（1794—1797）；同时，他也进行意大利与英国文学的双向翻译，帮助“两国人民更熟悉对方的文学”<sup>⑥</sup>。学界对《诗札》的关注明显不足，或仅仅将之视为《对文学的追求》的简略版<sup>⑦</sup>，或仅在谈论十八世纪英国的“东方故事”与中英文学关系时略有涉及，但却连其出版年份也未能确定<sup>⑧</sup>。劳伦斯·威廉斯点明了《诗札》的保守主义实质——“马塞厄斯利用乾隆回信乔治[三世]的文学手法，为[马戛尔尼]使团所据互惠理想进行辩护，同时对国内的辉格党人与改革派投以怀疑的目光”<sup>⑨</sup>，但未能关注该诗所蕴藏的英帝国观念，更忽略了作品假托为乾隆诗歌英译本这一特殊形式。事实上，《诗札》的政治表达与其“伪译”<sup>⑩</sup>身份密不可分。本文认为，《诗札》对国内激进主义的反击以及对东方殖民欲望的抒发，均依托其伪译形式，其核心策略不在于绘制某种中国形象，而在于利用中国的主体地位来构建和强化英国的政治身份。通过以中国皇帝的口吻批判英国国内激进主义、肯定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实践，《诗札》为英国的君主制与海外扩张行为找到了外部支持，折射出马塞厄斯所代表的部分英国人

① Anon., “Monthly Catalogue”, in *Critical Review*, 15 (1796), p. 454.

② Anon., “Monthly Catalogue”, in *Monthly Review*, 18 (1795), p. 336.

③ Anon., “Imperial Epistle from Kien Long”, in *British Critic*, 6 (1795), p. 230.

④ Anon., “Monthly Catalogue”, in *Critical Review*, 15 (1796), p. 454.

⑤ See Anon. [David Rivers], *Literary Memoirs of Living Authors of Great Britain*, vol. 2, London: Printed for R. Faulder, 1798, p. 32; see also Anon., “Biography”, in *Weekly Magazine*, 4.42 (1799), p. 80.

⑥ C. P. Brand, *Italy and the English Romantics: The Italianate Fashio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51.

⑦ See Howard Avery Burton, *The Life and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James Mathias*, PhD Disser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2, p. 93.

⑧ See Martha Pike Conant, *The Oriental Tale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6, p. 291; Qian Zhongshu,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4. 这两部代表性研究著作均将《诗札》的出版年份误写为1796年；虽然《诗札》所引用的文本中有1795年出版的书籍，但针对《诗札》的书评在同一年便已出现，由此可确定该诗出版时间为1795年。

⑨ Laurence Williams,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s Gaze: Satire, Imperialism,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2–1804”, in *Lumen*, 32 (2013), p. 102.

⑩ “伪译”（pseudotranslation）是翻译学术语，指冒充为译作的原创文本（see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 40; André Lefevere, “Pseudotranslations”, in Olive Classe, ed.,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vol. 2,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0, p. 1122）。

在确立民族自我身份之时对中国主体性的依赖与利用。同时，该诗也想象了中国皇帝对英帝国秩序的接受与顺服，使得中国的主体性遭到压制，甚至面临滑向殖民客体的危险。就此而言，《诗札》的这种文学机制集中体现了部分英国人此时对中国依赖与压制兼具的矛盾态度，同时也表明西方对东方并非单向的压迫与宰制，二者间其实存在着充分显现于十八世纪且绵延至今的张力与博弈。

## 一、中国皇帝的来信：《诗札》的伪译方式与文化表述逻辑

《诗札》的伪译实践缘起于马戛尔尼使团传回英国的消息。1794年7月31日，《伦敦纪事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访华使团》的匿名报告。该报告简明扼要地记录了使团在华期间的细节，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中提及乾隆在万寿节次日向使团赠送礼物——“一册他[乾隆]写给英王的诗歌，置于一个贵重而古老的雕刻精巧的黑木盒子之中”，但并未谈及这篇乾隆御制诗的具体内容。<sup>①</sup> 这为马塞厄斯的创作提供了想象契机与发挥空间：他顺势将《诗札》的源文本设置为这首“[乾隆]写给英王的诗歌”（*Imperial: x*），强调自己的创作“来自皇帝陛下，置于一个雕刻精致、美丽且贵重的黑木盒子之中，由1792至1794年派往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马戛尔尼伯爵阁下（巴斯勋爵士）送呈英王陛下”（*Imperial: Title Page*）。

马塞厄斯并非首位借此机会创作伪译之人<sup>②</sup>，但无疑是将伪译技法发挥到极致者。他先将《诗札》与乾隆诗歌的西译传统勾连在一起。对十八世纪欧洲人而

<sup>①</sup> See Anon., “Embassy to China”, in *London Chronicle*, 29–31 July 1794, pp. 110–111. 该报告流传甚广，同时也刊登在《绅士杂志》《星报》等报刊上。既有研究关注刊于《星报》的版本，指出该报告记录了使团在热河所历事件的细节，包含具体的日期与中国官员姓名，显然是基于使团高层传出的消息（see Laurence Williams,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s Gaze: Satire, Imperialism,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2–1804”, p. 97）。实际上，这份报告提及的乾隆赠礼是一件“御笔书画册页”（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01页），其文字内容现已无法确知，但马塞厄斯曾经与之有过因缘：册页到达英国后，由夏洛特王后收藏（see Henrietta Harrison, “Chinese and British Diplomatic Gifts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33, Issue 560 [2018], pp. 93–96），而马塞厄斯在1782年后长期担任王后的副司库（see Howard Avery Burton, *The Life and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James Mathias*, p. 10），很有可能在管理王后的财物时经手过该册页。

<sup>②</sup> 1794年8月2日的《晨报》刊有一份所谓[乾隆]皇帝致英王诗歌的散文体译本。这个所谓的“译本”讲述了一位中国皇帝的故事：该皇帝任用了一个江湖骗子作为他的首相，但这个首相及其党羽胡作非为，制造了各种祸患；虽然皇帝最终幡然醒悟，严厉惩治了这个江湖骗子，但苦果仍然绵延了许久（see Anon., “Embassy to China”, in *Morning Chronicle*, 2 Aug. 1794, no pagination）。但事实上，该文本所采用的“Van Vo Chi Tam”“Pim Yam Fu”“Tsum kim cham xam”等汉语词汇的音译形式，实则是对安文思《中国新史》中的“Van Vo Chi Vam”（万物之王）、“Pim yam fū”（平阳府）、“Tsum Kim cham xam”（尊敬长上）等汉语音译不解其意的引用或改动（see Gabriel Magaillans, *A New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Newborough, 1688, p. 324, p. 5, p. 225）。可见，这个所谓的译本并非某个真实中国文本的英文翻译，而是以中国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其意图应是影射与讽刺彼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

言，最著名的乾隆作品是《三清茶》，此诗先由在华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于1770年译为法语，随后被转译为包括威廉·钱伯斯译本（1773）在内的多个英译本。<sup>①</sup>《诗札》参照钱伯斯转译本，多次使用“梅花”（Meihòà）、“佛手”（Fo-sai）<sup>②</sup>等来自《三清茶》的汉语词汇的音译形式（see *Imperial*: 2），同时又在《前言》中以钱伯斯所述《三清茶》出版情况（see *Imperial*: v-vi）<sup>③</sup>为参照，强调《诗札》所谓的“原著”的重要性：“较之《三清茶》，[这篇乾隆御制诗]虽出版时声势较小，创作时却似更费思量、更为郑重其事。”（*Imperial*: viii）更重要的是，马塞厄斯还在副文本中提供“翻译”细节，以塑造《诗札》的“中文诗歌英译本”身份。至于自己为何能够胜任翻译工作，“译者”在《前言》中表示，虽然自己未能涉猎冯秉正所译《中国通史》，但已研读过有关该议题的其他重要作品，掌握了足够的汉学知识，并称除李自标外，马夏尔尼使团所聘学者与译者均是自己的助手，且还引用《中华帝国全志》所载汉字同音异义现象以证明自己的中文语言能力（see *Imperial*: i-iii）。这些细节使得《诗札》的“翻译”过程看似真实存在。同时，《诗札》还沿用《好逑传》英译本（1761）所建立的中国文学译本的译注传统，设置大量“译者注”，不仅解释正文中音译形式的汉语人名与词汇的含义，如将“Lin-fou”（林逋）与“Outong-chu”（梧桐树）分别解释为“有德行的饮茶者，为乾隆称赞饮茶的颂诗所提及”与“某种树木”（see *Imperial*: 8-9, 26），更展现了“译者”自身的汉学知识储备。例如，诗歌正文所描绘的小皮特入京场景中出现了火炬与灯笼，对应的“译者注”就引用格鲁贤《中国通典》<sup>④</sup>中有关中国皇帝在祭天场合使用火炬与灯笼的记载为证，并提醒读者，若想知道有关中国“灯笼节”的信息，也可参考《中国通典》第二册第323页的内容（see *Imperial*: 26）。此外，《诗札》还别出心裁地设置了“读者批注”，并在《前言》中写道：“因为《诗札》的译稿已在坊间流转，我有幸得到社会名流的各式评注，他们的通信让我受宠若惊，必须选出部分评论以飨公众。”（*Imperial*: ix）皇家美术学院的主席本杰明·威斯特、知名商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博物学者约瑟夫·班

① 详见王岫庐《乾隆〈三清茶〉的译介与影响》，收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主编《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秋季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86-194页。

② 对应诗句为“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御制诗文集[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7页）。

③ 邱博舜指出，钱伯斯提到的其实是《盛京赋》的出版情况（详见威廉·钱伯斯《东方造园论》，邱博舜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第81页）。

④ 此书与《中华帝国全志》均见于马塞厄斯藏书目录（see Robert Harding Evans, *A Catalogue of the Valuable Library of Thomas James Mathias*, London: Printed by W. Bulmer and W. Nicol, 1820, p. 23, p. 62）。

克斯等名人，均被马塞厄斯征用为其“译作”背书（see *Imperial*: 2, 4, 5）。

尽管马塞厄斯刻意强调《诗札》与中国的关联及其译作身份，但此诗不仅篇幅过长，且内容大量涉及英国人事，与《三清茶》英译本的风格相距甚远，故而有读者质疑其并非译作，如1796年的一篇书评写道：“作者如企图欺骗大众，以自己的诗作冒充乾隆书信译本，这种对公众轻信心理的利用太过拙劣，绝无丝毫成功的可能性。”<sup>①</sup>但这似乎又说明，马塞厄斯的目的并非以假乱真。按照研究者对文学伪作的目标的划分——“蓄意欺骗以求名利”与“作伪以求修辞效果”<sup>②</sup>，《诗札》显然属于后者，其伪译模式服务于特定的文化表达目的。事实上，不少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文学作品都假借东方人的视角与口吻，点评欧洲本土的政治、社会与宗教情况。此类作品被设定为东方人寄回母国书信的译本，研究者将之命名为“伪书信”<sup>③</sup>或“伪东方书信”<sup>④</sup>。欧洲的伪东方书信传统始于十七世纪末，首部重要作品是乔万尼·保罗·马拉纳以意大利语撰写的《土耳其间谍》（1684）。此书被设定为阿拉伯人马哈茂德寄给奥斯曼帝国官员的信件，内容则是对法国政治与军事情况的刺探，马拉纳自居这些阿拉伯语信件的意大利语“译者”，该书也因此奠定了“伪东方书信”假托东方作者观察、评论西方的基本模式。《土耳其间谍》的法文版（1684）与英文版（1691—1694）很快面世<sup>⑤</sup>，引发了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1721）等大量后继文本，这些作品所伪托的作者大多来自土耳其、波斯、印度、暹罗等东方国度。<sup>⑥</sup>

伪中国书信亦在此风潮中诞生，其发端应为意大利作家吉罗拉莫·吉利以手稿形式流传的《中国皇帝致教宗的信》（1712）。<sup>⑦</sup>德国作家达维德·法斯曼也在1720至1732年间连载发表了《奉钦命周游世界的中国人》，甚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也以法语写就《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1760）。<sup>⑧</sup>

① Anon., “Kien Long’s *Epistle to George III*”, in *Analytical Review*, 22 (1796), p. 43.

② See Anne H. Stevens, “Forging Literary History: Historical Fiction and Literary Forger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 37 (2008), p. 221.

③ Martha Pike Conant, *The Oriental Tale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155.

④ Hamilton Jewett Smith, *Oliver Goldsmith’s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A Stu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1.

⑤ See Aleksandra Porada, “Giovanni Paolo Marana”, in David Thomas and John Chesworth, eds.,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A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vol. 9: *We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 (1600–1700)*, Leiden: Brill, 2017, pp. 802–805.

⑥ See Pierre Martino, *L’Orient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 1906, p. 299.

⑦ See George McClure, “Apocryphal News and Apocryphal Truths in Early Modern Italy: Girolamo Gigli’s *Gazzettino* (1712–1713)”, in *Italian Studies*, 77.1 (2022), pp. 32–33.

⑧ See Wolfgang Bauer, “Die Rezeptio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in Günther Debon, ed., *Ostasiatische Literaturen*, Wiesbaden: Aula-Verlag, 1984, pp. 169–170.

在法国与英国，伪中国书信更为多见。法国方面有阿尔让侯爵的《中国人信札》（1739—1740）、维克托·德·拉卡萨涅的《中国间谍》（1745）、佚名作者的《中国秤》（1763）、安热·古达尔的《中国间谍》（1764）、佚名作者的《中国皇帝1782年致欧洲各君主的祝辞》（1782）等作品。最早在英国出现的伪中国书信是欧陆作品的译本：1712年，《中国皇帝致教宗的信》被译为英文刊于《旁观者》，阿尔让《中国人信札》和古达尔《中国间谍》也分别于1741和1765年被译为英文。首部英国人创作的伪中国书信应是霍勒斯·沃波尔的《叔和通信》（1757），最有影响力的则是奥利弗·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1762），其他较流行的文本还有查尔斯·约翰斯通的《旅者》（1775）与本文所关注的《诗札》。

与同时代更常见的中国书写相比，伪中国书信的文化表述形式颇为特殊：前者将中国作为被审视的客体，而后者却把中国设定为审视的主体。在此先以正反两个例子管窥以中国为审视客体的文本的文化表述逻辑。在十七世纪的威廉·坦普尔笔下，“中国实行君主专制，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没有其他法律”，对于这位“颂华者”而言，该制度在实践上超越了欧洲所有的政治构想。<sup>①</sup>到了十八世纪，同样关注中国统治者所谓“绝对权力”的丹尼尔·笛福也指出“[中国]人民惯于服从，其盲目程度，正与满大人专横地发号施令与统治之时相同……满大人说什么，什么就是法律”，但却给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他们政府的主要特点就是绝对暴政”。<sup>②</sup>显然，针对同一种所谓的“中国特质”，这两位作家因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而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坦普尔将中国塑造为“具有自然的伦理、政治德性的非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典范，并非为了“事实的完整与精确，而是意在提供道德指引”，试图以中国为“可供当下模仿的理想且毫无争议的对象”<sup>③</sup>；笛福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式描绘，则与他在《君权神授》（1706）中对托利党与安立甘宗高教会派所倡导的“被动服从”的抨击同出一源。笛福之所以写下“[中国]人民惯于服从”，是为了批评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与“君权神授”之辈，因为这些人要求英国人民屈从于王权与教权，这无异于奴役。<sup>④</sup>可见，在以中国为审视客体的书写模式中，中国的作用是成为英国本土政

① 详见威廉·坦普尔《论古今学问：坦普尔文集》，李春长译，华夏出版社，2021年，第137、141页。

② See Daniel Defoe,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with His Vision of the Angelick World*, eds. Maximilian E. Novak et al.,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142.

③ See Eun Kyung Min, *China and the Writing of English Literary Modernity, 1690–17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3.

④ See G. A. Starr, “Defoe and China”, 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3.4 (2010), p. 441.

治的镜鉴，故其形象随作者的现实需要而改变。

然而，伪中国书信并不以描述与评价中国为重点，因而并未具体塑造与呈现某种中国形象，反而让中国成为评判主体，将关注点直接集中于西方。因此，在伪中国书信中，“关于中国的元素全然浮于表面”，“旅行者的观察完全集中于法国、英国等东道主国家，目的是讽刺欧洲的习俗与看法，而非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sup>①</sup> 这并非伪中国书信的缺点，而是其鲜明的叙事特质。例如，在《世界公民》中，哥尔斯密虽偶尔也以塑造中国形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sup>②</sup>，但全书主体却是“中国人”李安济对英国政治、文化、宗教等情况的观察与评论。关于英国政治，李安济解释了英国的混合政制与人民的自由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在纯粹的民主政体中，若宽宥违法行为，政制本身会陷入危险，因此荷兰等共和国的民众必须严格遵守现有法律，结果却是成了自己所定法律的奴隶；但在君主制国家中，民众之上存在着能迫使其服从的有效权力（即君主），放宽法律的严格要求并不会危及政制。故而，包含君主制成分的英国政制允许民众不遵循那些无关宏旨的法律，这种植根于君主制的法律弹性，赋予了英国人较他国人民更高程度的自由。<sup>③</sup> 李安济对君主制优点的阐发，显然传达了哥尔斯密一直以来对王权的强调与对君主制的支持<sup>④</sup>。在宗教层面，李安济细致刻画了圣保罗大教堂中民众礼拜时的轻慢举动：参加礼拜之人或“透过眼镜窥探众人”，或“把热忱献给情妇，而非天堂”，还有人“窃窃私语”乃至“吸鼻烟”，甚至连司祭本人也“倦怠地读着今天的祷文”。<sup>⑤</sup> 哥尔斯密是爱尔兰的安立甘宗信徒，他心中的“宗教信仰”具有“社群性、仪式化的特点，同时扎根于实践”<sup>⑥</sup>，李安济的观察承载的无疑是哥尔斯密对彼时基督徒忽视宗教仪式的批判。由此可见，在伪中国书信这种亚文类中，“中国主体”充当权威叙事者，代作者发声，直接品评西方人事的正误高下。如果说在坦普尔-笛福式的中国书写中，西方主体通过将中国作为考察对象来定位、塑造理想自我，那么伪中国书信传统则是通过幻想中国主体持有西方

① See A. Owen Aldridge, “The Most Chinese of the ‘Chinese Letters’ Genre”, in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23.4 (1995), pp. 23–24.

② 例如，该书第 42 封信描绘了以“孝顺”为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see Arthur Friedman, ed., *Collected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2: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Oxford: Clarendon, 1966, pp. 176–177），以刻画一种上下有序、家国同构的政治秩序。

③ See Arthur Friedman, ed., *Collected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2: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pp. 210–212.

④ See Yuhki Takebayashi, “Oliver Goldsmith, Historical Thinker and Writer”, in *Eighteenth-Century Ireland*, 34 (2019), pp. 99–104.

⑤ See Arthur Friedman, ed., *Collected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2: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p. 175.

⑥ See James Bryant Reeves, “Religion”, in Michael Griffin and David O’Shaughnessy, eds., *Oliver Goldsmith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 126.

主体所持立场来证明该立场的普适性，以此确立西方人自我身份的合法性。

马塞厄斯对伪东方（中国）书信传统颇为熟悉，他的藏书包括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尔让的《犹太间谍》英译本、乔治·利特尔顿的《一个在英波斯人的信札》、古达尔的《中国间谍》等作品。<sup>①</sup> 作为伪中国书信的典型例证，《诗札》继承了这种特殊体裁的文化表述模式：该诗并非通过塑造中国形象这一方式来映照马塞厄斯心中的理想英国，而是以乾隆的名义大量指涉并评点英国的政治事件与人物。通过想象乾隆批评英国激进主义、赞许英国对印度的殖民，马塞厄斯得以彰显自身的保守立场，并为英帝国在东方的扩张确立正当性。

## 二、《诗札》的保守主义政见

《诗札》的政治表达首先应对的是法国大革命冲击下英国本土的激进与保守之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思想界立刻围绕大革命的原则展开了争论。不从国教者理查德·普莱斯于当年以《论对我国的爱》为题进行布道，主张君主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民众有权选择统治者，并在君主行为不当时将其罢黜并建立自己的政府；同时，他也要求平等的政治代表权。<sup>②</sup> 埃德蒙·柏克旋即撰写《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0）攻讦普莱斯的主张，认为必须“维护现有的教会、现有的君主制、现有的贵族制和现有的民主制，每一种都以其现有的比例存在，不再寻求增大”<sup>③</sup>。托马斯·潘恩则以《人的权利》（1791）迎战柏克，批评“世袭继承制政府”，推崇“实行选举的代议制政府”。<sup>④</sup> 至此，英国思想界出现了观点对峙：激进派重新界定并试图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保守派则着力论述传统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法国大革命同样对英国的政治实践造成了即时影响。在上层政治中，小皮特政府最初对大革命持观望态度，但辉格党内部则产生了裂隙，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等激进派视大革命为“法国版光荣革命”，对其表示支持，柏克则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双方于1790年公开决裂。大革命引发的政治波动渐渐导致小皮特政府对国内改革运动持警惕态度。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决

<sup>①</sup> See Robert Harding Evans, *A Catalogue of the Valuable Library of Thomas James Mathias*, p. 57, p. 30, p. 14, p. 18. 在该目录中，利特尔顿的《一个在英波斯人的信札》（*Letters from a Persian in England, to His Friend at Ispahan*）被登记为1744年版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但孟德斯鸠之作并未在是年重版，故而应为利特尔顿之作的第5版。

<sup>②</sup> See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in Iain Hampsher-Monk, ed.,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exts from Britain in the 179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7–51.

<sup>③</sup> 埃德蒙·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冯丽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9页。

<sup>④</sup> 详见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乐国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23页。

后，英法正式开战，反法、反改革的立场日益占据主导地位。1794年，辉格党内以波特兰公爵为首的保守派加入小皮特政府，显著削弱了福克斯一方的影响力。1795年，政府颁布《煽动性集会法》与《叛国法》，进一步在法律层面压缩激进派的政治活动空间。<sup>①</sup>在民间，虽有“伦敦通讯社”等激进派团体尽力争取更广泛、更公平的选举权，但“保护自由与私有财产、反对共和派与平等派协会”等效忠派团体也相应地“呼吁英国人民团结起来，去捍卫现存的社会秩序”，且效忠派数量更多，也更受民众欢迎。<sup>②</sup>

在文化层面，激进与保守两派也通过文学创作宣扬各自的政治主张：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威廉·戈德温等人分别撰著《安娜·圣艾夫斯》(1792)、《凯莱布·威廉斯》(1794)等“雅各宾小说”探索激进议题<sup>③</sup>，但匿名作者假称译自德文的《贝尔格莱德之围》(1791)与爱德华·塞耶的《林多尔与阿德莱德》(1791)等“反雅各宾小说”则出现时间更早<sup>④</sup>。除小说外，保守派作家也偏好诗歌体裁，1797至1798年间出版的《反雅各宾周报》是集中刊载保守主义诗歌的阵地。<sup>⑤</sup>《诗札》可被视为“反雅各宾诗歌”的先驱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反雅各宾文学中已出现东方题材作品，托马斯·赖特的《苏莱曼与法蒂玛》(1791)即为典型例证：该小说以克什米尔影射英吉利海峡，并塑造了宗教怀疑论者塞利姆这个人物，通过他暗讽宣扬激进思想的“新哲学家”，而小说中“上天分配给每个人的位置，正是其幸福之所在”的宗教训诫，在本质上与彼时保守派针对大革命的政治告诫——人必须安于现状，现有秩序即为最佳，法国人应得到怜悯而非艳羡——相通。<sup>⑥</sup>可以看出，《苏莱曼与法蒂玛》与坦普尔、笛福所代表的客体化中国书写相仿，均采用了将东方塑造为西方镜鉴的文化表述模式。就此而言，《诗札》是对东方题材反雅各宾文学的更新与拓展：它创造性地采用伪中国书信体裁，让乾隆这位权威叙述者评点法国大革命、英法战争及英国国内政治分歧，宣示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

① See Michael J. Turner, *British Politics in an Age of Refor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1–69.

② 详见哈里·狄金森《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1789—1815》，辛旭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23、60–62页。

③ See Gary Kelly, *The English Jacobin Novel 1780–1805*, Oxford: Clarendon, 1976.

④ 详见学者整理的反雅各宾小说目录（see M. O. Grenby, *The Anti-Jacobin Novel: British Conservat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43, p. 245）。

⑤ See John Strachan, “Poetry of the Anti-Jacobin”, in Duncan Wu, ed., *A Companion to Romanticis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9, pp. 205–213.

⑥ See M. O. Grenby, “The Anti-Jacobin Novel”, in J. A. Downi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60–462.

《诗札》的保守主义表达始于作品对中（乾隆）-英（马戛尔尼使团）-法（法国大革命）三股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重塑。彼时英国国内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1794年，亲政府的《真英国人杂志》指出，“欧洲传去的消息中充斥着雅各宾派的事迹，这破坏了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各项目标”，而反政府的《圣雅各纪事报》于179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也同样认为，“中国人深知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与影响”，因而“颇有提防，以免高卢式民主与无政府主义的种子被引入这个大帝国”。<sup>①</sup> 这些报刊普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清朝统治者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共和制等政治原则，因英法同属欧洲，这种地理上的临近让清政府对英国使团的来华目的心存疑虑。<sup>②</sup> 马塞厄斯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中国君主制与法国共和制之间的根本对立，在接受“中国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共和原则”的基础上，他策略性地扭转结论，将“中国提防所有欧洲国家”重塑为“中国与英国结盟共同抵抗法国大革命的威胁”。通过这一关键改写，《诗札》得以安排乾隆向乔治三世发出明确的政治警示，借此提醒读者，若不抵御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歪理邪说”，英王室将会灭亡：“那致命的陌生人来到骄傲的凡尔赛宫，/讲述着新法律、新政策与新真理，/庞大的体系因新准则而垮掉。/若贵国轻视她恰当的警报，/更怕高卢的武器而非高卢的道理，/你的冠冕必然褪色；皇家紫/必在民主的猩红中沉没。”（*Imperial*: 36-37）

在诗歌的保守主义底色上，马塞厄斯进一步发挥自己讽刺诗人的天职，借乾隆之口品评英国政要与思想家，具体地支持对法战争与国内保守路线。首先，《诗札》中的乾隆从西方古典文本中引经据典，高度赞扬在对法战争中立下功劳的武将文官。例如，《诗札》以古罗马勇士为参照，塑造了海峡舰队司令理查·豪英勇伟岸的形象：“首先是在你的海上，威严蹙眉，/戴着英国海战冠光荣凯旋的，/不可撼动的豪，傲慢法国的克星，/有着费边般的沉着与泰然的神情。”（*Imperial*: 9）“海战冠”是古罗马的军事奖励，专门授予在海战中首位登上敌船的士兵；“费边般的”则以古罗马名将费边·马克西姆的坚毅沉稳赞颂豪在“光

<sup>①</sup> See Andrew Bellamy, “Lord Macartney’s Duelling Fates: Writing, Reading and Revising the Macartney Embassy, 1792–1804”, in *Britain and the World*, 15.1 (2022), pp. 79–80.

<sup>②</sup> 这确有一定历史实据。马戛尔尼提到，钱德明曾于1793年10月3日告知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清]政府在知道欧洲发生大麻烦的消息后十分警觉，不加区分地将欧洲人视作引发骚乱者，如果使团在此事之前到达，那么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少得多的麻烦。”（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ed. J. L. Cranmer-Byng, London: Longmans, 1962, p. 151）钱德明此时在清朝廷担任翻译，又交游甚广，与清朝贵族关系良好（详见龙云《钱德明：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41页），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获知清政府内情。

荣的六月一日之战”（1794）中大胜法国的功绩。<sup>①</sup>为明确支持政府的对法战争，马塞厄斯还将战争大臣威廉·温德姆比喻为以诗歌激励斯巴达人的提尔泰奥斯：“皮特新任命的提尔泰奥斯，吹响战争的号角；/其才智足以将这要职增色，/他无惧民主派的奚落，/作为国家的朋友，有着口才与力量，/勇于思考与行动，同时护卫自己的思想。”（*Imperial*: 13）与之相对，《诗札》中的乾隆讽刺了致使战争失利的英国官员，首相小皮特的长兄查塔姆伯爵二世约翰·皮特便在其列：“兄弟之情也帮不了的他，/翎羽被拔，换了乌鸦毛的查塔姆。”同时，马塞厄斯还假借约翰·斯宾塞公爵之名在此添加批注，影射约翰·皮特执掌海军部时因对法战争失利而遭调职一事：“[乾隆]皇帝所用的典故再次带有本土色彩，这是中国的规矩：政府里的满大人从要职调到闲职时，他帽上垂着的孔雀翎会被拿掉，换成乌鸦毛。”（*Imperial*: 15）

其次，《诗札》也安排乾隆立场鲜明地点评激进与保守双方的代表人物。得到最高赞誉的是保守派的理论支柱柏克：“那位以更神圣火焰点燃/自己的智慧、学问与卓著声誉之人；/他勇往直前，力量胜过西塞罗；/……/他教授满载智慧的高明道理与宏大论述，/即便在图斯库路姆[西塞罗的哲学园]听到的都未必更好；/……/最后，他以神圣技艺建起神庙，/将他的凯撒置于中央的神龛；/他自任大祭司，只不过不戴橄榄冠，/他的前额绑着战士的发带；/……/何须说出建筑师之名，谁人不识柏克？”（*Imperial*: 11-12）本诗段的“译者注”随即指出：“[乾隆]皇帝以神庙的比喻来理解柏克有关法国事务的三部论著——《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致一位国民议会成员的信》《新辉格党致老辉格党的申诉书》。”（*Imperial*: 12）在马塞厄斯看来，柏克的贡献远胜于古罗马的西塞罗，柏克的著作堪比古罗马人的神庙，其本人则是将神谕带到人间的大祭司，这位“大祭司”之所以头戴“战士的发带”，是因为他能为对法战争提供理论武器。同时，《诗札》还在此设置“读者注”，假冒柏克本人亲自出马：“我对他们一概不信任：我也讨厌法国的政策、宣言、不虔敬、吹嘘、反复无常、虚伪与残忍。我同样倾向于防范他们的共和主义火山，无论是恐怖岩浆的喷发，还是那散发更危险柔烟的阴燃。”（*Imperial*: 13）就这样，通过先让“作者”乾隆高度评价柏克及其著作，再让“译者”进一步进行解释与强调，最后安排“读者”柏克亲自出马重申提防法国意识形态渗透的必要性，《诗札》反复提醒自己的目标读者，在英法战

<sup>①</sup> See John Ehrman, *The Younger Pitt: The Reluctant Transition*,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imited, 1983, pp. 349-350.

事正酣之际，一场思想与制度的意识形态之战也正在进行。

相较于对保守派的赞颂，“乾隆”直接讥讽了激进派，并警示向激进主义妥协的恶果。“乾隆”对辉格党激进派领袖福克斯评价极低，虽然在表面上说着“我本不愿说他那堕落的品行，免使他汗颜”，但其实不仅讽刺后者晚节不保，更指出后者的唯一贡献是激怒柏克，促成《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的问世，从而让英国不至于“缺失不朽的一页”（see *Imperial*: 21–22）。至于向激进主义退让的后果，“乾隆”想象了爱尔兰政策的结局：“爱尔兰的政策与天主教的狂乱 / 会从罗耀拉的地狱中炽热升腾， / 伴随着难以估量的冲突， / 受到邪恶疯狂的激荡 / 想把姐妹之邦从英格兰的守护中分离出去。”（*Imperial*: 20）马塞厄斯在此指涉的是威廉·菲茨威廉在任爱尔兰总督期间试图推行的“天主教解放”，该政策意在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更多的政治权利，使他们更加认同英国政府，以免滑向激进主义<sup>①</sup>；但是，马塞厄斯却借“乾隆”描绘的可怕场景指出，这种怀柔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激进主义的蔓延，反而会造成政局动荡，甚至让英格兰失去自己一直“守护”着的“姐妹之邦”即爱尔兰殖民地。

当然，《诗札》并未停留在对保守与激进两派的价值判断上，而是进一步畅想英国君主制所关联的全球利益，从而从愿景角度论证保守立场的合理性。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激进派与保守派都认识到，英国的政治体制与其全球扩张（尤其是东方殖民）所带来的利益是深度绑定的。激进派敏锐地察觉到了英国的贵族统治与东方殖民之间的共生关系，流传甚广的《专制主义的精神》（1795）就指出，英国的贸易公司凭借金钱所赋予的影响力，处处附和大臣的意见，丝毫不顾公众的利益、自由与人类幸福。在此基础上，该书作者还明言，若不限制这些贸易公司，英国将会陷入悲惨境地：

此类垄断公司正以赫拉克勒斯的棍子痛击自由，他们凭借巨人般的力量崛起，理性、论辩、法律、政制就如风中谷壳，都向其俯首。如果无法获得广大人民——那些尚未堕落为金钱崇拜者之人——的奋力抵制，那么它们必将继续，直至在泰晤士河边建立起“东方专制”：届时司空见惯的就会是，两个治安官骑着大象，市长坐在轿子里，由同业公会的职员抬着经过奇普赛街，急忙赶去匍匐在已变得如中国皇帝般煊赫的首相脚下。到时候，银行家建立起寡头统治，利德贺街上的大房子 [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 成了神

<sup>①</sup> See R. B. McDowell, “The Fitzwilliam Episode”, in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16.58 (1966), pp. 124–128.

庙，金牛犊变成上帝，都变得毫不稀奇。<sup>①</sup>

通过描绘英国官员采用“骑大象”“坐轿子”“像中国皇帝般接受跪拜”等指向“东方”生活方式的意象，《专制主义的精神》意在强调，东印度公司等垄断机构正在通过金钱的诱惑操控广大人民，若无人抵御，那么这些贸易垄断机构背后的英国政治精英就会变为践行“东方专制”的统治者。这种夸张的塑造既抨击当时英国的“政治团体通过对资本的操控，钳制了商人团体以及多数人民意见”，形成“新的专制体制”的局面，也揭示出，统治阶层对国内人民的役使依靠的正是东印度公司等机构提供的经济利益，亦即“殖民地的利益与垄断式的海外贸易”恰恰构成了政治精英统治的物质根基。<sup>②</sup>

如果说激进派揭示出海外利益为英国政治体制的存续奠定了经济基础，那么保守派则指出稳定的英国政治体制构成了获取海外利益的制度前提。保守派认为，对“政制的形式与原则”的“审慎保存”催生了大众对英国政府之安全与稳定的信心，进而“把其他国家的资本引向不列颠，并使全球的财富和奢侈品流经英国商人之手”。<sup>③</sup>在此逻辑下，英国的繁荣足以证明现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保守派也由此推导出“保存政制与政府，无须改革”这个结论。<sup>④</sup>《诗札》从文学想象的角度细化了保守派的辩护策略，它安排乾隆批评法国，暗示中英关系的基石是双方共同的君主制传统，并强调，若英国改用法国的共和政体，则毫无可能获得乾隆的好感，遑论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并打开后者庞大的市场。因此，《诗札》进而将视角从国内党派政治延伸到英帝国的海外战略，让乔治三世的“皇帝兄弟”（*Imperial: 2*）乾隆盛赞英帝国现有的殖民成就，同时表达对英帝国体系延伸至东方的接受。这暗示英国现有的殖民利益以及未来的殖民前景的必要前提便是其君主制度，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回击激进主义的威胁。

① Anon. [Vicesimus Knox], *The Spirit of Despotism*, London: s.n., 1795, pp. 186–187.

② 详见陈正国《从专制到东方专制——十八世纪英国殖民进程与东方专制论的源起》，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8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17年，第971–972页。

③ See Anon. [Frederick Hervey], *An Answer to the Second Part of Rights of Man in Two Letters to the Author*, London: Printed for F. and C. Rivington, 1792, p. 19.

④ See Amanda Goodrich, *Debating England's Aristocracy in the 1790s: Pamphlets, Polemics and Political Idea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1, pp. 91–93, p. 144.

### 三、“转向东方”：《诗札》的帝国话语建构

《诗札》对英帝国的想象与描述与同时代的帝国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英帝国而言，东方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研究者将这种地理上的特征命名为“转向东方”<sup>①</sup>。英帝国东方利益的核心是庞大的印度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在此统治了四千万人口，可支配的税金堪比和平时期英国岁入的三分之一，而对于英国本土渴望阶层上升的家庭而言，印度也能提供报酬优厚的工作机会，因此印度成了英国财富与实力的一大来源。<sup>②</sup>至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英间的贸易也在迅速上升。在小皮特政府颁布的《折抵法》（1784）大幅降低茶叶进口税后，东印度公司对华采购茶叶量剧增，政府也因此获得大量茶税，甚至占到岁入的百分之六至七。<sup>③</sup>不过，此时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实行“广州体制”：不仅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更对来华外国商人严加控制，使得“他们在广州的买卖活动以至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监管”，东印度公司因此要求英国政府派遣使团访华协商，甚至愿意为此出资。<sup>④</sup>在此背景下，以马戛尔尼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应运而生。使团一方面向清政府提出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等具体商业要求，试图为英国人谋取更好的经商条件<sup>⑤</sup>，另一方面也显露出针对中国的殖民欲望：在使团出发前，内政大臣亨利·邓达斯明确指示马戛尔尼需尽量获取“一小块土地或单独的岛屿”用来放货，如能获得这一据点，则须争取在该地“管理治安，对我们的属民行使司法的权力”，即便中国要求英方司法体系不可惩处中国人，那么至少也要让“英国臣民涉及犯罪时不受中国司法管辖”。<sup>⑥</sup>这种对领土与治外法权的渴求，清晰地昭示了使团实乃英帝国“转向东方”殖民战略的试探性一步。

不少同时代的英国激进文人勘破了马戛尔尼使团的帝国主义实质。他们首先

---

① Vincent T. 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763–1793*, vol. 1: *Discovery and Revolution*, London: Longmans, 1964, p. 62.

② See P. J. Marshall, “Britain without America—A Second Empire?”, in P. J. Marshall,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2: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82–583.

③ 详见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深圳出版社，2025年，第297–302页；P. J. Marshall, “Britain without America—A Second Empire?”, p. 582.

④ 详见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3页。

⑤ See 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p. 150.

⑥ See Henry Dundas, “Instructions to Lord Macartney, Sept. 8, 1792”, in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2, Oxford: Clarendon, 1926, pp. 237–238.

指出使团外交幌子的背后是统治阶层对东方经济利益的渴求。在《致马戛尔尼勋爵及其船只的书信体抒情诗》(1792)中,以“彼得·品达”为笔名的讽刺诗人约翰·沃尔科特想象了中国皇帝与马戛尔尼之间就使团目标进行的对话:“如今我听见高高在上的皇帝说道: / ‘请问各位想要什么?’ / 我又听到马戛尔尼高声喊道: / ‘皇上,本国王室已知晓您的富有, / 升起了对金钱的强烈渴望, / 便令我飞跃东方的大洋而来。’”在该诗的后续设想中,马戛尔尼向乾隆索要巨大的钻石作为送给英国王后的礼物,同时直言道:“当然,礼物是我们最渴望的东西, / 没什么辛苦,连经商的一半辛苦都不到。”<sup>①</sup> 沃尔科特的讽刺诗不仅指出使团的经济诉求,也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远东贸易的推手是希望借此机会获取中国风物件的经济精英<sup>②</sup>。此外,詹姆斯·吉尔雷著名的蚀刻画《外交官与随员在北京所受接待》(1792)则暗讽了使团的自我粉饰。研究者指出,吉尔雷已从报纸中获知使团准备了七政仪、天文钟等科学仪器作为礼物,以求彰显英国启蒙思想与制造工艺的有机结合,但他却将这些礼物绘制为儿童玩具等价值存疑的制成品,讽刺使团明明意在商业利益,却要包装上文化色彩。<sup>③</sup> 同时,这些文人也以印度为类比对象,抨击马戛尔尼使团不过是英国殖民侵占中国的先锋。大约在1792年,一位论派牧师威廉·谢泼德前瞻性地创作了诗歌《马戛尔尼访华使团颂》,以“华夏”的口吻揭露访华使团背后的侵略意图。<sup>④</sup> 该诗首先批判英国的全球扩张——“她[阿尔比恩]的十字<sup>⑤</sup>是压迫的勋章、战争的标志; / 她的子孙来去世界,和平不复出现”,随即以“恒河波涛中回荡着哭喊”指涉1770年的孟加拉饥荒,直接点明英国殖民给印度半岛带去的深重苦难,最后呼吁“华夏的子孙”“不要与之[英国]接触——牢记印度的失误……拯救上天赐予你们的国土”。<sup>⑥</sup> 该诗由此指出,若不抵御暗藏殖民欲望的马戛尔尼使团,中国只会给自己招致无穷的苦

<sup>①</sup> See Peter Pindar, *A Pair of Lyric Epistles to Lord Macartney and His Ship*, London: Printed for H. D. Symonds, 1792, pp. 16-17.

<sup>②</sup> See Laurence Williams,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s Gaze: Satire, Imperialism,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2-1804”, p. 92.

<sup>③</sup> See Douglas Fordham, “On Bended Knee: James Gillray’s Global View of Courtly Encounter”, in Todd Porterfield, ed., *The Efflorescence of Caricature, 1759-1838*, Farnham: Ashgate, 2011, pp. 62-63.

<sup>④</sup> 本文对该诗的讨论基于学者劳伦斯·威廉斯的分析(see Laurence Williams,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s Gaze: Satire, Imperialism,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2-1804”, p. 93),但补充了更多的文本细节。

<sup>⑤</sup> “十字”指联合王国旗帜上代表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和代表苏格兰的圣安德烈十字。

<sup>⑥</sup> See William Shepherd, “Ode on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in Roger Lonsdale, ed., *The New Oxford Book of Eighteenth Century Ve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87-788.

果，甚至如印度一般沦为殖民地。此后，沃尔科特还在《致狮子号战舰的颂诗》（1794）中用讥讽的语气将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陛下曾向富庶的印度抛鞋，/ 接下来，我的主人，中国必将成为您的沐浴盆。”<sup>①</sup> 沃尔科特在此征用了《旧约·诗篇》第60章第8节中的“沐浴盆”“抛鞋”等代表征服的意象，犀利地揭露出马戛尔尼使团得以成行的背景，即英国征服印度后燃起的针对中国的扩张野心。这表明，当时文学界中的激进派已广泛认识到使团的殖民使命。

在这种氛围下，《诗札》首先回应了针对使团经济目标与文化粉饰的批评，安排“乾隆”赞许英国全球贸易的互惠性质与道德意义，为英国的商贸诉求进行辩护。在马塞厄斯的塑造下，“乾隆”极为欢迎马戛尔尼使团，因为“在你[乔治三世]的感召下，她[英国]的声名清白无瑕，/ 没有贪婪的污点，也没有鲜血的罪过；/ 从南极到北极，善良而温柔的 / 贸易被教导着随仁慈的波涛翻腾，/ 广泛传播文明的福祉，/ 又为民族自豪增加新动力”（*Imperial*: 4-5）。在“乾隆”看来，英国与全球各国的往来只是为了和平贸易，结果更是为世界各地带去了福祉，英国的全球贸易由此被披上了道德外衣。这种将英国的全球商贸道德化的修辞在同时代文本中屡见不鲜。例如，乔治·利洛在戏剧《伦敦商人》（1731）中写道：“它[经商]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它通过互惠互利将相互的爱从南极传到北极。”<sup>②</sup> 《诗札》沿用此逻辑以“善良而温柔”“仁慈”“文明的福祉”等词汇描述英国的海外贸易，成功地将英国的海外商业扩张与西班牙等国被描述为充满“贪婪与鲜血”的暴力殖民区分开来，正如研究者所言：“十六世纪晚期以降，有关西班牙人残忍、不文明的‘黑色传说’一向是为英国殖民辩护的有力理由，在十八世纪西班牙国力衰落后，这一传说更成了英国道德优越性话语的基石。”<sup>③</sup>

不仅如此，《诗札》还指出，除商贸外，英国还同时在海外践行文明探索活动。在“读者批注”中，马塞厄斯安排谢菲尔德勋爵援引爱德华·吉本，指出英国的海外航行还“受到对科学与全人类之爱的感召”（*Imperial*: 4），并继而安排“乾隆”赞美库克船长：“你让那不朽的航行者如此航进，/ 他在不见天日的地方探索，/……/ 就让中国君主深情地面向他，/ 为库克在野蛮之地的坟墓缠上花环。”（*Imperial*: 5）在十八世纪英国，库克“对未知国家的探索”被誉为“在原住民

① Peter Pindar, *Pindariana; or Peter's Portfolio*, London: Printed by T. Spilsbury and Son, 1794, p. 228.

② George Lillo, *The London Merchant*, ed. William H. McBurne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 40.

③ See Trevor Burnard, “The British Atlantic”, in Jack P. Greene and Philip D. Morgan, eds., *Atlantic History: A Critical Apprais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25.

中传播了友谊与艺术，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擢升了本国的名声与地位”。<sup>①</sup>正是借此英雄形象，马塞厄斯强调了英国海外扩张“正面积极”的文明探索性质。

至此，《诗札》将英国的全球贸易与探索整体性地塑造为一项兼具互惠商业利益与崇高道德目标的事业，而非赤裸裸的殖民扩张。在确立了英帝国海外活动的道德正当性后，《诗札》回应的第二大问题就是马戛尔尼使团的“殖民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塞厄斯所面临的困难恰恰来自他所倚重的中国知识来源《访华使团》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统治者从印度王公那里了解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实践，由此认为使团包藏祸心，从而坚决拒绝了使团的要求：“〔使团〕未能成功，主要因为一些印度王公给中国朝廷植入了坏印象，他们警告中国朝廷，不要容许英国人在他们之间立足，又用虚假的说法来强化自己的告诫：英国人最初以友好姿态在印度获取一处小据点，后来通过反复征战扩大其版图，把原来的土地所有者驱离领土，在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庞大帝国。”<sup>②</sup>《访华使团》明确记载了历史上的乾隆对英国殖民印度活动的了解与反感，但马塞厄斯却视而不见，彻底改写乾隆的态度，使之为印度殖民背书。诗中的“乾隆”首先歌颂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二任印度总督查尔斯·康沃利斯在第三次英迈战争中的丰功伟绩：“然后可以见到康沃利斯的形貌，/沉着、老道、英勇又宁静；/下方的浮雕上还刻画着/孝顺的人质与帝国的敌人：/他在迈索尔外声如雷鸣；/可怕的声音/震慑，并限制了暴君的疆界。”（*Imperial*: 9-10）这段引文所指涉的，是康沃利斯于1792年击败迈索尔王国的统治者蒂普苏丹并迫使后者遣送儿子为质这一事件。在彼时的英国，蒂普苏丹被塑造为“暴君”，而其子能在英国师长的教诲下重新开始人生则被宣扬为英国的“慈善之举”。<sup>③</sup>马塞厄斯征用了此种帝国话语，安排“乾隆”从东方君王的立场出发，指出康沃利斯征战迈索尔的结果是“限制了暴君的疆界”，由此将英国征战印度本土王公的行径转变为遏制暴政在印度半岛蔓延的正义之举。之后，《诗札》将更高的赞誉给予了“大英帝国在印度的主要缔造者”<sup>④</sup>、英国东印度公司首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最后是曾如帝王般昂然直立，/但现在面色苍白、眼神沮丧的/黑斯廷斯，伟大

① See Kathleen Wilson, “Pacific Modernity: Theater, Englishness, and the Arts of Discovery, 1760–1800”, in Colin Jones and Dror Wahrman, eds., *The 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s: Britain and France, 1750–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69.

② Anon., “Embassy to China”, in *London Chronicle*, 29–31 July 1794, p. 111.

③ See Jennifer Howes, *The Art of a Corporatio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s Patron and Collector, 1600–1860*, Abingdon: Routledge, 2023, p. 91.

④ Hermann Kulke and Dietmar Rothermund, *A History of India*,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p. 186.

的、受伤的、充满争议的名字，/ 是印度的光荣，还是耻辱；/……/ 朱庇特的雷霆都未对他造成伤害！他曾让众邦屈服，/ 当时满载名誉与高贵的光荣，他手中 / 掌握着代表不列颠的权杖：/ 现在却成了国家的受害者，/……/ 他被如此贬抑在弹劾的丧服之下，/ 英国正向那迟来的正义躬身祈求。”（*Imperial*: 25–26）此处引文指涉的是黑斯廷斯弹劾案：黑斯廷斯回国后，因其在担任印度总督期间（1772—1785）所犯下的“重大罪行与不当行为”而遭到下议院弹劾，1788年上议院开启审理，除贪腐、受贿、滥用司法权和专制等指控外，控方尤其强调的罪名包括通过侵略战争非法占据印度领土，违反条约，以及对印度本土统治者与人民公然实施暴力。可见，弹劾的核心关切之一在于黑斯廷斯的印度治理模式。这场弹劾展现了两种英帝国话语的碰撞：黑斯廷斯践行的帝国治理策略是出于宗主国的国族利益对被殖民者进行的征服与统治，而控方则深信，英帝国理应成为去领土化的普遍正义的载体，超越英国的国族利益，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权与被殖民的印度社会之间的公正的裁决者。<sup>①</sup> 1795年，旷日持久的弹劾案结束，黑斯廷斯被判无罪。《诗札》渲染了黑斯廷斯的殖民成就，肯定了他的无辜，显然站在黑斯廷斯所代表的一方，支持英帝国对其他民族与地区的武力征服与统治。

最后，《诗札》还想象了清朝统治者对英国的亲近态度，投射出将中国纳入英帝国体系的期望。诗中的“乾隆”期待着以超规格的礼节接待小皮特：“哦！愿我渴望的眼睛迎接皮特的形貌，/ [他] 志得意满地走过北京拥挤的街道，/……/ 卓越的阁老！我王国的光荣和力量：/ 在观众的庄严注视下，/ 我将皇家高傲的黄色丝带系在他腰间，/ 上面鲜明绣着你的金狮 / 与中国的五爪龙相结合。”（*Imperial*: 7–8）马塞厄斯在此设置的“读者批注”指出：“[五爪金龙] 这图案除皇室外无人可用”，可见“皇帝把皮特视为了家庭成员”（see *Imperial*: 8）。当然，在《诗札》想象的英中关系中，英国处于权力高位，这体现为该诗对清朝官员与小皮特一行人身体姿态的描写：“当他们如此经过时，我的满大人会躬身。”（*Imperial*: 26）历史上，英国使团与清朝官员交往时采用的是握手这种“英式礼仪”<sup>②</sup>；虽然马塞厄斯无从获知中英

<sup>①</sup> See Mithi Mukherjee, “Justice, War, and the Imperium: India and Britain in Edmund Burke’s Prosecutorial Speeches in the Impeachment Trial of Warren Hastings”, in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3.3 (2005), pp. 594–595, p. 627.

<sup>②</sup> 马戛尔尼曾记录王、乔二位清朝官员与使团成员交往时所行礼仪：“当 they 要离开时，他们像英国人一样与我们握手。”（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p. 71）斯当东也曾记载中国钦差松筠“热情地与本森上校与麦金托什船长以英国方式握手”（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2, London: Printed by W. Bulmer and Co., 1797, p. 453）。

外交场合的真实情形，但在十八世纪英国，深鞠躬这种礼仪已逐渐式微，甚至在社会心理中有着奴颜婢膝的意味，而商人在交易中惯用的体现“平等主义”的握手礼已随商业化的进程而流行，成为标准的会面礼仪形式之一<sup>①</sup>。通过想象清朝官员向小皮特与英国政要的肖像鞠躬，《诗札》将清朝置于权力下位，明确表达了英国宰制中国的欲望。但是，这种宰制欲望却关联着一个亟须殖民者解决的问题：殖民者是否会因沾染上被殖民者的“劣习”而改变自身特质？在十八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驻印军队深受印度本土习俗的影响，例如，一位名为约翰·柯林斯的上校有好几位印度妻子，出行时总有印度士兵、马匹、大象和轿子相随<sup>②</sup>。在印英国人的“印度化”生活方式引发了英国人对“土著化”——“殖民者为土著的生活与习俗所同化而遭到污染”<sup>③</sup>——的恐惧，而不再穿着西方服饰正是土著化的重要象征<sup>④</sup>。在“乾隆”的幻想中，小皮特“脚穿丝靴，身着曳地丝缎”，“透亮的红宝石在他的帽子上闪烁，/孔雀翎垂在他的衣服上”（see *Imperial*: 7-8）。马塞厄斯在此挪用了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对乾隆衣着的记录：“他的衣服包括一件宽松的黄色丝绸袍子，黑色天鹅绒的帽子，帽顶有一个红球，并饰有一支孔雀翎，这是一等满大人独有的标志。他穿着金色绣纹的丝靴。”<sup>⑤</sup> 让英国首相身着清朝服饰，甚至戴上“一等满大人”特有的孔雀翎，这与《专制主义的精神》所想象的英国官员骑大象等“东方化”生活方式一样，暗示着土著化这一威胁，因此《诗札》让“乾隆”亲自戳破自己的迷梦：“啊，我真是痴心妄想：/皮特充耳不闻，对皇家旋律不屑一顾，/……/我的眼睛永不会见到/英王选中的大臣身着鞞鞞衣袍。”（*Imperial*: 29-30）如此，通过明确否定土著化可能，《诗札》强调，如果英国殖民中国，英国殖民者仍能保持自身的文化纯洁性，不会受到“鞞鞞”蛮族的文化影响。

综上所述，《诗札》植根于英国国内党派政治与英帝国全球拓殖语境，而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这一具体外交事件则直接促成了作品的诞生。作者马塞厄斯将自

① See Penelope J. Corfield, “From Hat Honour to the Handshake: Changing Style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enelope J. Corfield and Leonie Hannan, eds., *Hats Off, Gentlemen!: Changing Art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ris: Éditions Champion, 2017, p. 16, p. 18.

② See Randolph G. S. Cooper, “Culture, Combat, and Colonialism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7.3 (2005), p. 541.

③ Bill Ashcroft et al.,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p. 132.

④ See Linda Colley, “Going Native, Telling Tales: Captivity, Collaborations and Empire”, in *Past & Present*, 168 (2000), p. 178.

⑤ 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Printed for J. Debrett, 1795, p. 175. 当然，这种记录有想象的部分，事实上乾隆的帽子上不可能有官员所用的孔雀翎。

己创作的文本设定为乾隆送给乔治三世的诗歌，通过“伪译”这种创作模式将自身政见归于中国皇帝名下，以此进行双重政治表达：批判英国的宿敌法国并谴责国内的激进主义；赞许英帝国在海外播撒文明的道德行为，确立英国强力殖民的正当性，并同时指出英国人在宰制异族的过程中仍能维持自身文化身份。该双重表达在逻辑上深度相关：唯有不受激进主义影响、保持现有的君主制度，英国才可与同为君主制国家的中国建立起官方联系，英帝国才有扩张至东亚、获取更大的殖民利益乃至将中国纳入囊中的机会。

《诗札》可以被理解为十八世纪英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主体地位的文学表征。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到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特质，更获得了中国这个独立于西方的主体对世界的记录与解释，这种记述甚至成了当时的西方知识体系不得不回应的对象。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记述与西方年代体系之间的龃龉便是典型例证：在彼时的基督教历史框架中，大洪水是人类历史的新起点，诺亚是现存人类的共同先祖，较权威的观点将大洪水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 2348 年；然而，与之相抵触的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1658）却列举了七位大洪水之前的中国帝王，并将中国的信史追溯至公元前 2952 年的伏羲时代。这种时间上的矛盾让西方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年代体系，转而利用《圣经》七十士译本的记录将大洪水的时间提前。<sup>①</sup> 随着欧洲大陆的汉学书籍不断被译为英文，英国人也深刻意识到中国作为能动主体的本质，并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想象：若中国主体认可西方的意识形态，那便可以证明西方意识形态的普适性。基于此种想象，英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不少本土作者描绘与品评西方但却伪托中国来源的作品。<sup>②</sup> 马塞厄斯将《诗札》归入乾隆名下之举，显示了他对中国主体性的承认

① 详见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95-397、413、425 页。

② 十八世纪英国的伪中国来源作品颇为繁盛，在此仅列出十部作品为例：[William Hatchett], *A Chinese Tale*, London: Printed for J. Cooper, [1740]; [Robert Dodsley], *The Oeconomy of Human Life*, London: Printed for M. Cooper, 1750; [Miles Wilson], *The History of Israel Jobson, the Wandering Jew*, London: Printed for J. Nickolson, 1757; [Horace Walpole], *A Letter from Xo Ho, A Chinese Philosopher at London, to His Friend Lienchi at Peking*, London: s.n., 1757; [Oliver Goldsmith],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or, Letters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er, Residing in London, 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1762; Anon., *The Bonze, or Chinese Anchorite, An Oriental Epic Novel*, London: Sold by Dodsley, I. Water, Messrs. Becket & Hondt, and F. Newbery, 1769; Anon., *Kien Long: A Chinese Imperial Eclogue*, London: Printed for J. Almon, 1775; [Charles Johnstone], *The Pilgrim: or, A Picture of Life*, London: Printed for T. Cadell, [1775]; Anon., *The Oriental Chronicles of the Times: Being the Translation of a Chinese Manuscript; With Notes Historical,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1785]; [Thomas James Mathias], *The Imperial Epistle from Kien Long, Emperor of China, to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c. &c. &c. in the Year 1794*, London: Printed for R. White, [1795]。

与倚重，通过幻想中国主体的认可，他得以为英国的君主制度与帝国战略寻得合法性。当然，《诗札》也预示了中国主体性在英国文化想象中的衰减。十八世纪末的马戛尔尼使团让英国人首次领教了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现实影响力，也让他们意识到中国主体性对西方殖民主体构成的制约。使团亲历者所言之“我们进入北京时像贫民，待在那里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流浪汉”<sup>①</sup>，便是英国殖民主体在中国遭到限制的明证。为了对抗这种现实可能引发的焦虑，《诗札》安排“乾隆”赞许英国的意识形态，并同时想象“乾隆”对英帝国秩序的欣然接受，这让“乾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的主体性遭到削弱，甚至开始滑向被殖民者的客体地位。此后，英国的文化心态在整体上逐渐转向，相较于通过想象中国主体的认可来获取文化自信，英国人开始更倾向于压抑中国的主体性以确立自身的政治文化优越性。就此而言，《诗札》成了伪中国来源作品的转折点，昭示着这一文学传统在十九世纪的衰微<sup>②</sup>，而彼时客体化中国的文学书写模式则日益成为主流<sup>③</sup>。

[作者简介] 张执遥，男，1995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十八世纪中英文学关系、翻译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中国来源”伪译〈僧侣〉与18世纪英国国教拯救观》（载《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4期）等。

责任编辑：龚 蓉

① 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p. 181.

② 在十九世纪英国，仅见查尔斯·兰姆所著《烤猪论》（1822）与佚名作者所著《通过中国眼镜看到的英国》（1897）。前者是假托中国来源的伪译，兰姆称友人“M.”（即汉学家万宁）翻译了一部中文手稿，其中记载了烤猪技术在古代中国的发现过程（see Elia [Charles Lamb], “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 in *London Magazine*, 6.33 [1822], pp. 245–248）；后者被设定为中国作者 Wo Chang 的英文创作，该书评论了当时英国的家庭生活、教育、社会等各种情形（see Anon., *England through Chinese Spectacles: Leaves from the Notebook of Wo Chang*, London: Cotton Press, 1897）。另外，有研究者称约翰·威尔逊·克罗克的《一封被拦截的信》（1804）是由“中国的通信者”（Chinese correspondent）所作（see Joseph Lennon, *Irish Orientalism: A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4），但此书实则被设定为身处广州的欧洲东印度公司商人 J. T. 先生写给都柏林友人的信件，不属于伪托中国来源的作品。

③ 例如，二十世纪初，客居香港的英国人詹姆斯·达尔齐尔曾以中国式姓名“Sin-Shang”在《南华早报》上连载《一个直辖殖民地的编年史》（1906），但当该作以《远东的上流生活》（1909）为题在伦敦结集出版时，著者的名字却被改回作者本名，由此成为“出于殖民者视角的直接呈现”（see Ross G. Forman, *China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Empires Entwin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87）。该事件表明，在伦敦出版商的构想中，伪中国来源的作品已无法获得英国读者认同；相较之下，由西方叙事者讲述的东方故事，即客体式书写，才更具合法性，也会更受国内读者的欢迎。